

## 聯盟政治與威懾外交

● 夏亞峰

柯慶生的主要觀點是，儘管地緣政治、實力政策和國內政治很重要，但最能解釋「威懾外交」成敗和隨後出現的地區安全程度的是「聯盟政治」。作者利用亞洲冷戰中的幾個熱點事件來檢驗和修正聯盟政治和威懾外交理論。



Thomas J. Christensen, *Worse than 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柯慶生 (Thomas J. Christensen) 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公共政策與國際事務學院 (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國際政治

講座教授、中國與世界研究項目 (China and the World Program) 主任。他不僅是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學派的重要掌門人之一，還是著名的「中國通」，曾於2006至2008年任美國國務院主管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

《比鐵板一塊更糟糕：亞洲聯盟政治與威懾外交的問題》(*Worse than 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以下簡稱柯著) 是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於2011年推出的柯慶生新作。柯著的主題「威懾外交」(coercive diplomacy)，主要是指利用除戰爭之外的威脅 (threats) 和承諾 (assurances) 雙管齊下的手段，迫使對手改弦易轍。柯慶生的主要觀點是，儘管地緣政治、實力政策和國內政治很重要，但最能解釋威懾外交成敗和隨後出現的地區安全程度的是「聯盟政治」(alliance politics)。作者利用亞洲冷戰中的幾個熱點事件——朝鮮戰爭 (1950-1953)、台灣海峽危機 (1954-1955、1958)，以及兩次印度支那戰爭 (1946-1954、1965-1975) 等，來檢驗和修正聯盟政治和威懾外交理論。

本書涉及的主要時間段是1949至1969年，也兼及後冷戰時期(1991-2009)東亞的國際關係。柯慶生認為，如果戰爭打響了，那麼對方陣營愈分裂，對己方愈有利；但在非戰爭時期，如果對方陣營是分裂的，一個國家運用遏制和威懾的外交手段就不太有效。這是因為，要使威脅和承諾有效，敵對陣營必須有同一個聲音和步調一致的政策。

柯著論述的是冷戰時期的亞洲安全和外交，特別是美國遏制「試圖改變國際格局現狀」的共產黨國家聯盟的努力。從1950年代末期起，由於北京和莫斯科從嚴重分歧到分裂，中國和蘇聯競相加強了對世界革命的援助，最典型的例子是對越南共產黨領導的反美救國運動的支持。從美國政策制訂者的角度來看，此時的共產黨陣營「比鐵板一塊更糟糕」(頁146-208)。柯著最大的學術貢獻不是柯慶生所發現和使用的最新史料，而是他將歷史事實與國際關係理論有機地融合在一起進行的討論和分析，對亞洲冷戰中的重大事件進行新的解讀。正如哈佛大學江憶恩(Alastair I. Johnston)教授指出的，「柯慶生是同時具有政治學者的理論分析能力、又能像歷史學家一樣寫歷史的少數幾位國際關係學者。」(封底)

柯著共分八章：第一章是導讀，主要是提出該書的理論分析框架及全書的概要；第八章是全書結論。第二至七章，分階段依次論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亞洲聯盟政治與威懾外交的運用情形。其中第二、三兩章主要討論在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共產黨陣營和反共

陣營形成之初，由於各自陣營內部缺乏協調而導致雙方嚴重誤判對方的問題。柯慶生認為這一點特別表現在北朝鮮領導人金日成利用共產黨陣營內部的不協調以及中共和蘇共的意見分歧，於1950年6月發動朝鮮戰爭以及戰爭在同年秋季升級。

在第二章，柯慶生首先以朝鮮戰爭爆發來闡述以上觀點。他提出，由於朝鮮戰爭爆發前的幾個月，美國杜魯門(Harry S. Truman)政府對台灣國民黨政權和南朝鮮李承晚政權缺乏明確的安全承諾，因此助長了北朝鮮的侵略行徑，損壞了遏制戰略所應起的作用。在共產黨陣營，北朝鮮作為力量最微弱的一方，最終能夠勸說斯大林和毛澤東，支持它發動危險的戰爭。儘管此前在1949年春，金日成請求斯大林批准他向南朝鮮進攻未遂；但到了1950年4月，斯大林改變想法，原則上同意金日成對南朝鮮發動進攻，但金必須得到毛澤東的同意。

金日成於1950年5月中旬來到北京，告訴毛澤東斯大林已經批准他對南朝鮮發動進攻，希望毛也支持他。毛發現中國處於兩難境地。儘管毛和斯大林一樣，低估了美國大規模直接對朝鮮進行軍事干預的可能性，但毛顯然比斯大林和金日成更擔心美國會派日本軍隊先行進入朝鮮參戰，挫敗北朝鮮軍隊的進攻態勢，把戰火燒到中國。另一方面，毛又急於向斯大林表明自己是一名國際主義戰士，是東亞共產黨聯盟的領袖，不是一名鐵托份子。毛不能承擔不支持鄰國完成革命事業的罪名。歸根結底，毛需要斯大林的支持來武裝中國的軍隊，以便

柯著最大的學術貢獻不是柯慶生所發現和使用的最新史料，而是他將歷史事實與國際關係理論有機地融合在一起進行的討論和分析，對亞洲冷戰中的重大事件進行新的解讀。

柯慶生認為從1956到1969年中蘇關係由分歧到嚴重惡化，使得美國利用威懾外交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努力更加困難。中蘇分裂和競爭所帶來的對激進共產主義運動的支持，實際上嚴重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

解放台灣；同時，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國防現代化，都離不開蘇聯的支持和幫助。

在第三章，柯慶生首先以朝鮮戰爭在1950年10至11月升級為例來加以說明共產黨陣營缺乏協調如何影響到威懾外交的成效。柯著認為，1950年9月美國及聯合國軍隊在仁川登陸後，共產黨陣營內部成員之間缺乏信任和統一規劃，不能向敵方發出強有力的信號，失去了阻止敵軍跨越三八線的機會；同樣，由於中國在美軍登陸仁川後沒有馬上出兵北朝鮮，導致美國情報部門認為，中國在東北三省駐軍主要是為了保衛中國領土，而不會出兵朝鮮。就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而言，柯慶生還認為，在1950年，由於斯大林已把領導亞洲革命的責任交給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在1950到1954年對越共革命的重要援助和支持，大大超過了同期蘇聯可能給予越南的支持，這主要出於毛鞏固中國共產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的考慮。這再次表明，由於共產黨陣營內部缺乏來自莫斯科的統一領導，使得東南亞的革命更具冒險性和鬥爭性，給反共陣營製造了更多麻煩。

第四章涉及1951到1956年，柯慶生認為這是共產黨陣營和反共陣營得以鞏固，也是中蘇關係相對和諧的時期，而這種狀況使得共產黨陣營的對外政策相對溫和，步調也趨於一致，有利於1953年7月在板門店簽訂《朝鮮停戰協定》以及在1954年召開日內瓦會議，為結束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達成妥協。在這一時期，北京和莫斯科在結束朝鮮

戰爭和印度支那戰爭問題上的立場基本一致，對金日成和胡志明這些地區性共產黨領導人激進的鬥爭戰略，起到了限制作用。

1951年1月初，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戰爭中的兩次戰役取得重大勝利，將戰線推至三八線以南。作為戰地指揮官，中國人民志願軍總司令彭德懷考慮到戰場的實際情況，要求部隊進行休整兩個月。然而，以金日成為首的朝鮮勞動黨領導人卻主張速戰速決，要求中國人民志願軍縮短休整時間，繼續南進，將美國和聯合國軍隊趕出朝鮮半島。後來，由於斯大林的直接干預，金日成被迫讓步，同意彭德懷的計劃。同樣，在印度支那，1954年春奠邊府戰役之後，胡志明希望將革命推進到越南南方。然而，中蘇在此問題上立場是一致的，提醒胡志明如果此時將戰爭升級，對越南革命和國際革命運動，均是十分危險的。

第五、六兩章主要論及1956到1972年間中蘇分裂和競爭如何使得亞洲共產黨變得更加激進和冒險。柯慶生認為，從1956到1969年中蘇關係由分歧到嚴重惡化，使得美國利用威懾外交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努力更加困難。特別是在印度支那，直到1969年中蘇發生邊界流血衝突之前，中蘇分裂和競爭所帶來的對激進共產主義運動的支持，實際上嚴重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中蘇競相支持東南亞和世界各地的革命運動，最大的受益者是第三世界的革命運動，包括胡志明和古巴卡斯特羅 (Fidel Castro) 所領導的革命。在1960年代當蘇聯人對越

共領導的革命內戰還漠不關心時，越共得到中國大量的物質援助。中國的援助為胡志明提供了與美國支持的南越政府鬥爭並最終打敗美國軍隊的財力、物力和信心。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 (Nikita S. Khrushchev) 下台後，蘇共新領導人勃列日涅夫 (Leonid I. Brezhnev) 和柯西金 (Alexei N. Kosygin) 改變前任的政策，開始加強對越共的軍事和經濟援助。而蘇聯對越南的新政策主要是為了與中國競爭，以便贏得越共和世界各地共產黨人的支持。儘管蘇聯從1960年代中期起，加強了對北越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但蘇聯很擔心東南亞戰爭升級。因為在蘇聯看來，在與西方全球性的競爭中，東南亞並非美國的核心利益所在。從1965年初起，蘇聯最感興趣的是促成美國與越共和平解決問題。但到1968年，這一國際談判已經沒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主要是由於中國對越共施壓，拒絕蘇聯的和談倡議，以及中國指責蘇聯是修正主義份子，與美國勾結，破壞像越南一樣的革命鬥爭。

北京和莫斯科在一系列問題上的重大分歧和關係的最終破裂，導致雙方在1969年發生嚴重的邊界流血衝突事件。美國及其反蘇的盟友是最終的得益者，中美關係在1970年代實現緩和是最重要的結果，中國亦接受了美日同盟和美國與台灣的防務關係。中蘇邊界衝突和軍事化，使蘇聯為此付出巨大的軍事代價，甚至最終成為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之一。柯慶生認為從1973年美軍撤出越南到1991年蘇聯解體，中美關係中沒有嚴重的對立事件，中國基本是與美國站在一起反對蘇

聯。鑒於其他已出版的著作對此已有詳細論述，柯著對這一段歷史僅做了簡單交代。在這一時期，除了在涉及台灣的防務方面中美有較大分歧外，美國在亞洲的聯盟體系基本比較穩定。

第七章重點討論美台關係和美日同盟關係如何成為後冷戰時期中美安全關係中的突出問題。柯慶生認為，這一問題產生的背景與1950年代大不一樣。儘管此時中美兩國還不是盟國，但也不是敵人，而是重要的經濟夥伴，並且主張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合作來處理國際問題。在處理台海關係問題上，中美兩國關係也時有緊張，兩國也不時使用威懾外交的手段。1990年代，在蘇聯這個中美共同敵人垮台之後，北京的部分專家對美國的東亞防務關係的形式和功能表現出不安和誤解。特別是冷戰的結束使得北京開始擔心美國在東亞的同盟和安全關係，因為這種同盟和安全關係與冷戰時期美國對華的威懾外交有很驚人的相似之處。這一章論述了在這種新情況下，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如何平衡有效的威脅(美國繼續售台武器以便加強台灣的自衛能力)和可信的承諾(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也不遏制中國)。由於這些錯綜複雜的情況，使得中美關係、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关系在過去二十年時有緊張。但總體看來，中美在過去近二十年中，還是比較好地處理了中、美、台三邊關係。

柯著自2011年出版以來，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美國人文社會科學在線外交及國際關係史專欄(H-Diplo)以圓桌書評討論會的形式，邀請了四位知名學者對該書

柯氏認為從1973年美軍撤出越南到1991年蘇聯解體，中美關係中沒有嚴重的對立事件，中國基本是與美國站在一起反對蘇聯。除了在涉及台灣的防務方面中美有較大分歧外，美國在亞洲的聯盟體系基本比較穩定。

鑒於柯氏曾在政府工作的背景和經歷，其對冷戰結束以來中美關係、中日美三角關係、台灣問題等的闡述和分析，充滿精深獨到之論，令人耳目一新，相當值得重視。

進行評述，他們的評論文章已於2012年3月7日刊出，對柯著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著名冷戰史研究學者、美國康奈爾大學中美關係史教授陳兼稱讚該書「提供了新穎而促人深思的關於冷戰時期及後冷戰時期聯盟政治的複雜含義解讀」。陳兼提議，學者應根據該書的重要論述來重新評價他們過去關於冷戰某些重大特性的判斷（參見“Review by Chen Jian”，*H-Diplo/ISSF Roundtable Reviews* III, no. 11 [2012]: 10, [www.h-net.org/~diplo/ISSF/PDF/ISSF-Roundtable-3-11.pdf](http://www.h-net.org/~diplo/ISSF/PDF/ISSF-Roundtable-3-11.pdf)）。

筆者認為，柯著對國際關係理論和東亞安全研究領域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柯慶生提出了一個有悖常

理的理论假设，即和諧的共產黨國家聯盟比分裂的共產黨國家聯盟更有利於地區穩定。冷戰時期的歷史表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同盟對付和諧的共產黨國家聯盟比對付分裂的共產黨國家聯盟更容易。這一理論假設的基礎，建立在作者充分利用近二十年解密的中國、美國和俄國冷戰時期的檔案資料以及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之上。柯著對我們理解二戰結束以來東亞地區的一系列安全問題很有裨益。鑒於柯氏曾在政府工作的背景和經歷，其對冷戰結束以來的中美關係、中日美三角關係、台灣問題等的闡述和分析，充滿精深獨到之論，令人耳目一新，相當值得重視。

## 道德本體的置換與憲政體用的重構

### ● 田飛龍



張千帆：《為了人的尊嚴——中國古典政治哲學批判與重構》（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

北京大學法學院的張千帆教授在2011/2012學術年度陸續推出了十餘本學術著作，如同集束炸彈一般散落在學界。當然，集中出版並不意味着同時創造，而是不同時段之主題沉潛與學術構思的自然結果。在這些作品中，《為了人的尊